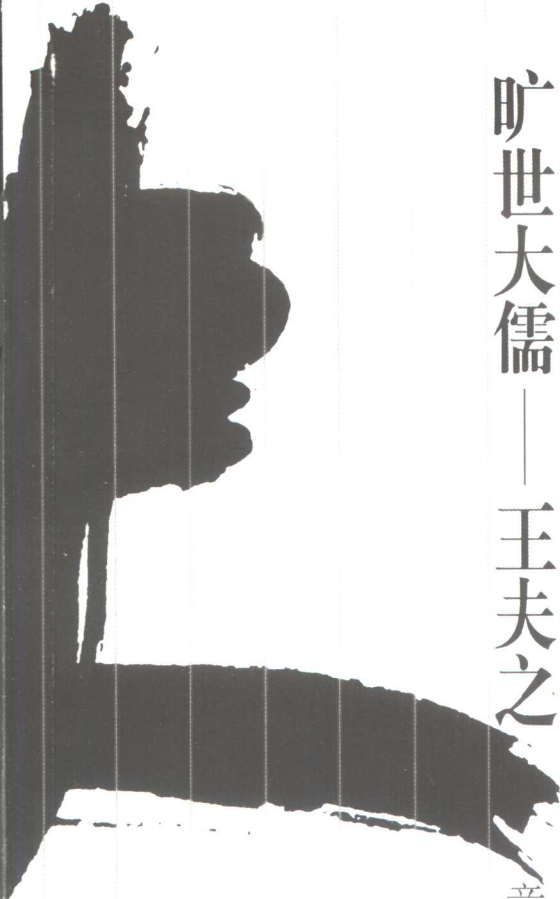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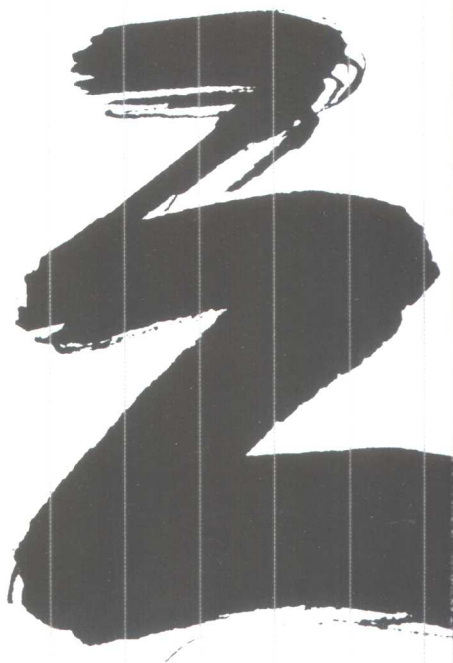


旷世大儒——王夫之

章启辉 ●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旷世大儒——王夫之

章启辉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旷世大儒——王夫之/章启辉著. —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1.1

(旷世大儒)

ISBN 7-202-02817-4

I. ① 旷… II. ② 章… III. ③ 王夫之-传记 (1619—1692)
IV. B24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83333 号

丛 书 题	旷世大儒
书 名	旷世大儒——王夫之
作 者	章启辉 著
责任编辑	李大星
美术编辑	马少华
封面设计	李颖明
责任校对	张三铁

出版发行	河北人民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印 刷	河北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8.75
字 数	207000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
书 号	ISBN 7-202-02817-4/K·690
定 价	14.6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写在前面

在 2000 几百年前，中国的思想领域曾发生过一个煌耀光驳的时代，产生过驰骋其想象、自由其意识、生发其学说、论辩其观念的百家诸子。儒作为一种观念学说，便是发祥于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时代。

当然，儒之先贤们并没有想到的是，他们所执意于心的这样一种而不是其他几种甚至也没有其他任何一种观念形态，竟然对中国的思想领域持续了如此漫长的笼罩制衡，将 2000 几百年中文明传承、更迭经世凡累朝累代，幅员如此辽大，人口如此众多，文明脉络如此凝聚传衍的国度中人或曰人群的意识，基本收放于其虽云博大却不无偏颇的范畴中。

这样一个结果，虽然有统治阶层的权利控制和知识人士的良苦用心在其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儒，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学说，除了含有帝王操纵术的功利成分之外，确实拥有适应于中国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尤其是中国人思维、生存乃至自慰的合理内核。比如相对于其他各家各学说而言，它更与封建制度之下的小农经济、宗法制度以及大一统政治相适应，在等级秩序、伦理观念、氏族血缘等方面，同中国古老的社会传统有着现实的密切关系，因而具有其他各家各学说无法替代的社会功能。而且，所谓内核的合理，其实正体现于，在如此绵长的时间之维下，帝王、朝代风云变幻，可在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后，却皆如萧规曹随般地，对儒有一种不离不弃的盘桓情结。其

间，虽然也有诸如焚书坑儒、黄老倡行的逆势，但儒却始终没有退出、淡却。个中的意义，的确是耐人寻味的。

战国末期，儒门大师荀况的门生，却是法家之显者的韩国诸公子韩非，曾在他著名的《五蠹》中说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关于“乱”与“不乱”的结论，这里不烦讨论，但这段话中透露出的信息，则是：第一，儒乃是以“文”（当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文”）来使人主“礼之”，也即是用观念、意识影响人主，取得人主信任的，而非什么其他的“资源”。第二，如果说韩非所痛绝的“五蠹”中，儒之外的游侠、纵横家、患御者、商工之民更多的是依恃于一种实用、实际的“技术”层面的介质的话，儒，则实际凭借的是，比之其他四者的“方技”胜出一筹的“术”。这种“术”对“人主”而言，是超脱于怡情悦目、口腹欲求之类的本能生理界面的，纯粹理念性、社会性的东西，是人主、帝王不能不需要的东西。儒，在中国的地位和价值，于斯已可窥见。

当然，从仲尼孔丘伊始，迄止于封建之末，儒作为一家之言，在如此漫长的阶段中，也确实必然要经历几多变化、调试和发展。学者黎鸣先生以为，从总体把握上讲，可以将儒的发展，归纳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先秦之儒，是为儒家，乃原教旨意义上的学说，是儒的本相；

第二个阶段，汉代之儒，是为儒教，是神学化了的儒，当然是伪神学，是儒的变相；

第三个阶段，宋明之儒，是为儒学，是哲学化了的儒，当然也是伪哲学，也是儒的变相。

这样的归纳，当然令人有耳目一新、提纲挈领的感觉，尽管从理论上说，这样的归纳也许会使人有某些异议。

先秦时代的儒，尤其是孔丘的儒，尽管他的本意不能不有说帝王以治天下的理想，但其周游列国并不得意的结果，使得他的学说或曰证明他的学说中，“人”的成分更为浓厚。因此，这时的儒，更有纯粹意义上的“学说”色彩，更有醇儒的感觉。这一点，从这个时期三个重要人物（孔、孟、荀）皆被后世无可争议地尊为“子”，而非像后代诸儒那般毁誉不一，“子”得不那么坚决，或许也可透露出若干端倪。

逮至汉代，中央集权的建立，当然已经迥异于先秦的诸侯割据，同时也完全不同于仲尼所向往的周朝。大一统的天下，确乎需要大一统的思想来提控。正如马勇先生所论述的那样：“在专制主义制度里，王权高于一切，要限制王权，只能借助于神权。所以，在中国，在西欧的封建社会里，凡在政治上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几乎无一不借助神权来表达自己的人权。”这时的儒，之所以能在思想领域里“君临”百家，其神学色彩不能不起着重要的作用。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的儒，宜乎其之成为“教”也。

宋明时代，理学的强化，也许是儒作为一种学说、思想发育、发展的一个不能越过的阶段，即不能不有一个玄化的阶段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邃密、严格的过程。当然，这种过程究竟对儒之发育、发展有什么正向或反向的重大意义，则是另外的问题。

当然，这样的勾勒，虽然便于把握脉络，却也不无偏颇，比如，在若干阶段之间，其实仍然存在重要的观念、重要的人物、勾勒之余，是不应当将其遗漏的。

至于所谓“新儒学”，当是结合西方哲学的产物，其实与我们这里谈的儒发生了游离，因此不再置喙。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中国之思想领域，向有儒、释、道三

足鼎立之说、之实。此言或许不谬。但是，如果从一个新的角度看，所谓释、道，虽然一为舶来，一属本生，然归其本旨，其实不过只是儒在他界的补充、对应而已。

回到原点。有鉴于儒之对于中国其实也是对于世界的重大影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来对其进行表述、描摹，将具体的儒者作为诠释儒之轨迹的符点，便是《旷世大儒》丛书的选题动机。据此，经过斟酌、讨论，确定在时间上截止于古代，在人选上以十种十一人的规模作为定位。这十一个人物是：孔丘、孟轲、荀况、董仲舒、程颢、程颐（此兄弟二人为一种）、朱熹、王守仁、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具体的书名，则依传主最为通行的称谓。当然，这些人选其间具体的取舍定夺，也并非容易，而是颇费了一番殚思周折的。

丛书没有采用聘请某位学界前辈担纲主编的惯常定势，虽然这样做颇可省心和藏拙。最终的办法，是采用逐个地确认各传主研究的个中之人，然后酌定撰写作者。这当然是费力又未必讨好的办法，但于责任编辑的责任，则或许颇有会心的体验。

应当说，在丛书选题创始之时，原有统一的撰写体例和设想。但由于各个传主的不同境遇、不同时期史籍对不同传主记载的详略多寡，以及不同作者对各个传主的不同理解、阐释，于是在风格、处理、取舍、把握等等方面，十种传记之间是颇有一些差异的。前贤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也许，这种种不同，才或者能从诸多个侧面体现出斯儒的发育、发展经历，体现出这些旷世大儒的韵味、风采和人格吧。

编 者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

目 录

第一章 生平与著述	[1]
一、家世与家学	[1]
二、求学与举业	[7]
三、遭逢国变，愤起抗清	[15]
四、屏迹居幽，著述以终	[35]
第二章 六经责我开生面	[59]
一、明末清初的学术流变	[59]
二、天道，人道，《易》道	[69]
三、《尚书》的“精髓”	[80]
四、《诗》言情，治国治情	[84]
五、《礼》的精神：务实，躬行	[91]
六、《春秋》义海，文化救亡	[97]
七、理学《四书》学的批判总结	[105]
第三章 中国古典哲学的空谷绝响	[128]
一、宇宙的本质是实有	[128]
二、理气一体，理依于气	[134]
三、道器相须，天下惟器	[142]
四、动静皆动，变化日新	[150]

五、性生日成，已成可革	[167]
六、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	[178]
七、行先知后，知行相资	[185]
八、古今因革，理势相成	[197]
第四章 十七世纪启蒙思想家	[208]
一、中国早期启蒙思潮的基本特征	[208]
二、以民为本的经济思想	[215]
三、公私之辨对“家天下”的否定	[224]
四、理欲合一，义利统举	[235]
五、兴学校，育才是急	[241]
六、情理激荡的审美情趣	[249]
附录 王夫之年表	[260]
主要参考书目	[271]
后记	[274]

第一章 生平与著述

一、家世与家学

公元 1619 年 10 月 17 日，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一代大儒王夫之，诞生在南岳衡山回雁峰、湖南衡州府城南王衙坪（今属衡阳市）。先生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买姜翁、一瓢道人、一瓢先生，或瓢道人、双髻外史、夕堂等等。因晚年隐居衡阳县金兰乡石船山（今衡阳县境内），自署船山老人，或船山老农、船山遗老、船山病叟，学者尊称船山先生。

船山家世祖籍太原，出自姬姓之后。溯父而上，一世祖王仲一为江南扬州府高邮州人，元末起兵，从明太祖朱元璋渡江走中原，功官山东青州左卫正千户。永乐初，二世祖王成从明成祖朱棣南下，以功擢升怀远将军轻车督尉，世衡州卫指挥僉事，遂籍衡州。至六世祖王震，船山家世均以武功显。^①

船山先世由武习文，溯源五世祖，始自六世祖。五世祖昭勇将军王纲“风裁刚正，姻治文墨”。六世祖骠骑将军王震掌卫事，尤笃志经术理学。当时，著名理学家庄昶谪官湖南，“公与讲性

① 王夫之：《家世节录》，《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 210—212 页，岳麓书社 1988 年，下同。

命之旨，零坛唱和”。船山称：“家世以武功显，束修文教，弦诵不衰，则自公始也。”高祖王宁，号一山居士，“始以文墨教子弟，起家儒素”。曾祖王雍，号静峰，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乡贡，历任江西南城教谕，“惇笃不随世好，以文名著南楚”。^①

父亲王朝聘（公元1570—1647年），字逸生，一字修侯，是一位隐居不仕，研究天文、地理、经史、兵法、农林、水利的饱学秀才，一生在家乡讲学授徒，以武夷朱学为志，学生尊称武夷先生。叔父王廷聘、王家聘，兄王介之、王参之，均治学终身。

船山家学以儒学为宗。从五世祖嗣治文墨，六世祖讲性命之旨，到高祖起家儒素，曾祖名著南楚，船山先祖独崇儒术，不屑佛道。父亲王朝聘少年师事大儒伍学父，研及群经；问道邹德溥，以真知实践为学。万历年间，心学盛，禅学起，船山父亲独宗濂洛，敦尚践履，不务顽空，“终身未尝向浮屠老子像前施一揖”。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正月，武昌都督左良玉追击张献忠部至长沙，湘乡土弁杀掠衡、湘间，遗尸四野。王朝聘募僧拾而掩埋，但事后他对家人解释说：“此亦神道设教之意，汝曹勿谓我佞佛而或效之。”王朝聘也曾与释憨山德清辨率性，“清为挫屈”。由于国故明亡，势不可为，许多明朝仕士，包括船山好友郭都贤、方以智、金堡、管嗣裘等，不愿向清统治者屈服，也为了避免迫害，就出家为僧，或遁入道门。因此，船山一生与佛道有不解之缘，多有诗文唱和和学问切磋。但是，他矢志不“逃禅”；晚岁《传家十四戒》，仍教子：“勿以子女……为僧道。”^②

① 王夫之：《家世节录》，《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211页；《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09页。

② 王夫之：《家世节录》，《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215—216页；《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12页；《船山诗文拾遗》卷一，《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922页。

船山父亲对船山一生影响直接与深刻。王朝聘的老师伍学父学识渊博，精通“天文、地理、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书”。王朝聘传其学，“虽从事制义，而究极天性物理，斟酌古今，以发抒心得之实”。“所受于学父先生者，天人理数财赋兵戎，罔不贯洽”。又以之教其子，“闲坐则举先正语录，辨析开晓，及本朝沿革、史传所遗略者，与前辈风轨。下及制艺，剔证长谈，中夜不息”。受父亲影响，船山为学有广泛的知识兴趣。船山四子王敌说父亲自少喜从人间问四方事，于草木鱼虫，江山险要，土马食货，典制沿革，都极意研究；于天文历法，算学医理，卜筮星葬，皆一一精讨；读史一定细读注疏，于书志年表，考驳同异，人之所忽，详慎搜阅，更以闻见证之。王朝聘的另一个老师邹德溥系出姚江学派（王阳明学派），其祖父邹守益早岁潜学程朱，后又师事王阳明，因而学主折中，兼采朱王：一方面讲“良知”；另一方面又不愿入于禅，而重存诚慎独、躬行实践。王朝聘以濂洛为“正传”，同时“承东廓（指邹守益）之传，以真知实践为学”，“奉诚意为宗，密藏而力行之”。船山回忆道：“夫之稍与人士交游，以雕虫问世，每蒙呵责，谓躬行不逮而亟于尚口，孺子其穷矣。……呜呼！奉若不恪，既不能自立不朽，而家学载之空言者且将无托。”船山学术宗旨虽有异于父亲，以张载关学为正学，但是，在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学术旨趣取向上，他与父亲是一致的。他严词攻击阳明后学，但攻击的主要是“杂于禅”，是阳明后学的“禅化”。如：“当万历中年，新学浸淫天下，割裂圣经，依傍释氏，附会良知之学。”对于邹守益之学，仍尊为“圣学”。继家学传统，崇经世、尚践履、敦务实，成为船山学术最重要的特色之一。王朝聘“少治诗，徙治春秋”，于五经，尤其是《春秋》，“精为研凿”，“所向即倾动人士”。十岁那年，船山从父受经义。二十

四岁，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以《春秋》魁与长兄介之同登武昌乡榜。二十八岁，父命编《春秋家说》。五十岁，历二十二年，成《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船山一生，遍治四书五经。^①

船山称父亲“早颖”，“少从乡大儒伍学父先生定相受业，先生授徒殆百人，先君子为领袖”。“早受知于邑令胡公，……自童子中，以国士相期。……凡两最童子科，乃补郡文学”。然而，王朝聘一生仕途坎坷。虽年轻时已考取秀才，但万历中年“七试乡闈不第”，仅于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四十八年（公元1621年）“两副秋榜”。船山归之于“铨法大坏”，“选政大坏”。如四十八年置副榜，即是因为“对策犯副考朱黄门，黄门不怿”。辛酉年明熹宗登基，恩予副榜贡太学。这时，王朝聘已年过五旬，仍应贡入京师国子监，希望三年卒业后能依例受一官半职。谁知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吏部铨选，他因未纳贿，只定个正八品。船山道：“时选政大坏，官以贿定，授正八品官。”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春，他赴京师谒选，吏部铨郎对谒选者，特别是辛酉副贡，及其苛刻，暗索贿赂。王朝聘深感羞辱与愤慨：“是尚可吏也乎？吾以求一命为先人故，俯折至此。若出贼吏胯下，以重辱先人，是必不可。”遂于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呈辞仪曹，拂袖而归，从此打消仕进的念头，家居十七载，以讲学论文，蒔药灌畦，深居简出，教授弟子为乐。^②

① 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11—113页；《家世节录》，《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218、221页。王敌：《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73、76页。

② 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11页；《家世节录》，《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217、218页。

对于命运不测，仕途多舛，王朝聘心存遗憾，深感有愧祖先。他曾对仲弟廷聘说：“吾岂为是濡需者，念家世桀戟，徒受儒术，少峰公所业不就，每自快悒。冀得一命恩纶报泉壤，生不能为奉檄之喜，尚补夙心于百一耳。”所谓“少峰公所业”和“一命恩纶”，都是指科举取仕。然而，对于自己耻循仕途“捷径”，永志不悔。崇祯四年回家后他对船山兄弟说：“吾不能辱己以邀一命报父母，汝兄弟若饶半绌，必不可使我受封，重吾不孝。若违命相縻，陷亲之罪，汝无遁于两间也。”共同的历史背景、文化积淀和坎坷人生，使父亲的“节”与“孝”，即志节孝亲，对船山后半生海痕至深。他于《显考武夷府君行状》写道：“呜呼！天崩海涸，介之以青衫终老，夫之裹创从王二不逮覃恩之期，以此仰酬吾父之言，亦有自然凑泊，与吾父赫赫明明之遗志相吻合者乎！”同父亲一样，船山及其长兄介之都是以勤奋求学、志在举业开始，以青衫布衣，隐遁林泉而终（二兄参之早逝）。船山称之为“仰酬吾父之言，亦有自然凑泊”。这里的“自然凑泊”，有明末清初“国变”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儒家文化积淀；有内心深处的对国事的悲愤、无奈、“独怆然而涕下”；也有几分“与吾父赫赫明明之遗志相吻合”的不期与怅然。船山说：“死于林峦之下，非兄志也。”实际上，也是船山心迹，亦或说心志的真情流露。^①

叔父王廷聘对船山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王廷聘（公元1576—1647年）字蔚仲，号牧石，擅长史与诗，学生尊称牧石

① 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12页；《石崖先生传略》，《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04页。孔子：《论语·泰伯》，《论语·公冶长》。

先生。船山称叔父“文笔孤清”，“文因道胜”，与父亲“同受业于伍学父先生之门，匪徒文誉齐腾，抑且德隅均整”。十九岁那年，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船山始从叔父读史，同时研习诗歌，知比耦结构。由于父亲“于文词诗歌，不数操觚。盖以简桢性情，惧艺成之为累”，船山一生诗歌创作和研究著述，主要得益于叔父廷聘，并深受其影响。船山回忆说：“先生少攻吟咏，晚而益工，于时公安竟陵哀思之音，歆动海内。先生斟酌开天，参伍黄建，拒姝媚之曼声，振噌吰之亢韵。”“仲父和易而方介，恬于荣利，博识，工行楷书，古诗得建安风骨，近体逼何李而上，深不喜竟陵体诗，每颦蹙曰：‘何为作此儿女嚬脱！’”与叔父学脉相承，船山在公安、竟陵体“姝媚之曼声”风靡一时之际，亦不阿俗好，独步古朴深厚之作，于先秦汉魏晋唐古诗均予以深入研究与选评。^①

此外，船山长兄介之（公元1606—1686年）字石子，一字石崖，号耐园，又号铤斋，终身致力经学，于《易》、《诗》、《春秋》尤专，著有《周易本传质》、《诗传合参》、《诗经尊序》、《春秋四传质》、《春秋家说补》等书。船山四岁从长兄开蒙，至七岁便读完了十三经，并共同履历了十余年的举业艰辛。船山称：“兄为学笃敬”，“一时文章巨公推赏者不绝。”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以乙榜诏入太学，同舍竞猎六曹，不思问学，“兄以父母老，……拂衣不请而归。”晚年，自题座右铭：“到老六经仍未了，及成一点不成灰。”在学术气氛如此浓厚的家庭中耳濡目染，对船山学成大儒，无疑受益终生。^②

① 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25—126页；《家世节录》，《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215、223页。

②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287页。王夫之：《石崖先生传略》，《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02、104页。

船山家世当曾祖王雍时，颇务豪盛，家境仍相当殷实。但到祖辈时，却由于祖父王惟敬喜性挥霍，纵酒自匿，“素不屑治家人产，及大故，囊不名一钱”，以致“家徒壁立”，家境日趋困窘。父亲王朝聘自幼专心读书，耻于问利，也不善谋生。船山道：“薄田不给饔粥，……称贷繁猥，一皆酬偿。”“禁夫之兄弟不令置田宅，仅以给一年丰凶之中为止，曰：‘安有儒素而求田问舍者，且贪之媒而祸之始也。’”“凡受业于先君者约数十辈，束脯之仪，以贫而却之者半焉。”在船山充满敬意的记忆中，父亲勤俭持家，德范闾里，虽家道中落，“凡十年未尝一饱食一暖衣”，但始终不懈船山兄弟读书之事，且润及宗姻。^①

二、求学与举业

船山自幼“颖悟过人”，四岁时就与二兄参之同入家塾，跟长兄介之读书。长兄比船山大十三岁，已于先年考入衡阳县学。船山称兄“于世故雅不欲涉”，但由于“家仅壁立”，父亲又应贡入京，不得不一边读书一边“下帷书粥”当私塾先生，以“支补”家用。父不在，长兄如父。对于两个弟弟，王介之严而又慈。船山称：“仲兄赖以愈（二兄参之自幼多病）而卒读，以文章名南楚，无一非兄曲意怡声，亶亶讲说以成之者。”“若夫之狂放无度，而繁括弛弓，闲勒逸马，夏楚无虚旬，面命无虚日者，又不待言。”由于长兄教导有方，船山“资敏而心甚细，一目十行，一字不遗”，船山七岁便读完了十三经，八岁便肄业私塾。这一年，武夷公归自京师，因拒贿赂仅仅得了个正八品，但尚能

^① 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10页；《显妣谭太孺人行状》，《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17页。

“欣然尽遣诸胸中”，未至绝意仕途的地步^①。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船山十岁，开始跟随父亲学习经义。此后数年，少年船山大量阅读古代哲学与史学经籍。《船山经义》记道：“忽念身本经生，十岁授之父。”《夕堂永日绪论》记道：“余自束发受业经义，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经义亦数万首。”经学是封建科举的敲门砖。广博的经学阅读，深厚的经学根底，为船山举业打下了扎实的经学基础。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十四岁的船山一举考中秀才。由于他“智慧早开，才气横溢”，被湖广提学僉事王志坚选拔到衡阳县学深造。这一年，武夷公自京师罢谒选拂袖而归。少年船山初试顺意，无疑给他莫大安慰。^②

次年夏，十五岁的船山同两位哥哥到武昌应乡试，都没有考取。九月返乡后，船山回到县学继续学习。在县学的四年中，他饱览县学藏书，一心进学，两次县学考试都名列第一，深得县学主教、湖广提学僉事水佳允赏识。崇祯九年（公元1636年），十八岁的船山又和两个哥哥到武昌应乡试，再次落榜。两次考试都没能中举，他感到既茫然不快，又强烈渴望，跃跃再试。他在《荡妇高楼月》、《黄鹄矶》两首诗中写道：

白云不觉飞，但见月东去。

碧海浸迢遥，瞥眼多疑误。

① 王夫之：《石崖先生传略》，《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01页；《家世节录》，《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218页。王啟：《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76页。

② 王夫之：《船山经义·序》，《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第631页；《夕堂永日绪论·序》，《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817页。王啟：《大行府君行述》，《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70页。